

## 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sup>\*</sup>

崔明德

西魏北周时期极其复杂的形势,使中央上层和地方官员更加深入思考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系,形成了推诚布信、劝以耕稼、引导民风、以“廉简”治理“群蛮”、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积极抚慰及恩威并用等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西魏北周在与东魏北齐争斗过程中增加了获胜的变数。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具有四个特点:儒家思想是主要思想来源,“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理念,“抚”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以及善于从多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

关键词:西魏北周 民族关系 民族政策

作者崔明德,烟台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地址:烟台市,邮编264005。

南北朝时期,西魏北周在与东魏北齐争斗过程中,由弱变强,最终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为隋唐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西魏北周取得如此成就,既与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外交有关,又与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有关。目前学界已对西魏北周的政治、<sup>①</sup>经济、<sup>②</sup>文化、<sup>③</sup>军事<sup>④</sup>和民族关系<sup>⑤</sup>等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研究,但对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重视不够,研究成果较少,本文拟对此作一全面梳理和系统探讨。这一时期民族关系非常复杂,无论是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向背,还是西魏北周所辖地区少数民族的态度,都对西魏北周政权的稳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AMZ0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sup>①</sup> 刘国石:《简论西魏北周改革——兼论孝文帝改制未尽之历史任务》,《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杨翠微:《西魏北周政治斗争与中央集权之加强》,《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4期。

<sup>②</sup> 赵文润、陈鼎中:《西魏北周时期的关中农业》,《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张文华、苏小华:《西魏北周的财政与政治》,《求索》2006年第11期;史卫:《隋唐财政制度之北周渊源略论》,《唐都学刊》2007年第5期;王明前:《试论北齐北周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努力》,《兰州学刊》2012年第2期;薛海波:《论关陇集团的整合与维系:以西魏北周国家财政与武川镇豪帅经济关系为中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年第3期。

<sup>③</sup> 赵文润:《西魏北周时期的社会思潮》,《文史哲》1993年第3期。

<sup>④</sup> 谷霁光:《西魏北周统一与割据势力消涨的辩证关系——四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南昌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朴汉济:《西魏北周的赐姓与乡兵的府兵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苏小华:《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熊伟:《西魏北周府兵制组织系统功能与作用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sup>⑤</sup> 刘戈:《论突厥与北朝、隋的政治关系》,《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刘春玲:《试论北周、隋与突厥的“和亲”》,《阴山学刊》1994年第3期。

定及对外争斗产生重要影响。受篇幅和文献记载匮乏所限,现在很难完全复原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的全貌,这里主要以西魏北周与所辖部分少数民族的关系,分析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实践及特点。

## 一、“推诚布信”

“推诚布信”即推崇诚意,广布信义,对少数民族以诚相待,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少数民族。在西魏北周时期,辛昂、于翼和杨敷等人都以“推诚布信”方式妥善处理民族关系。

辛昂在西魏废帝时任龙州长史,领龙安郡事。龙州一带地处山谷,“旧俗生梗”。辛昂以“推诚布信”方式处理各种关系,结果“威惠洽著,吏民畏而爱之”。任成都令时,辛昂鉴于“成都一方之会,风俗舛杂”的复杂情况,“便与诸生祭文翁学堂”。辛昂对他们说:“子孝臣忠,师严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诸生及其家人都按照辛昂的“教诫”行事,于是“井邑肃然,咸从其化”。北周时期,益州富庶丰足,是军国所用的主要来源。但因路途艰险,运输“每苦劫盗”。周武帝诏令辛昂使于梁、益,“军民之务,皆委决焉”。辛昂“抚导荒梗,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宁静”。天和初,隆州刺史、司宪中大夫陆腾征讨信州“群蛮”,“历时未克”。周武帝派辛昂到通、渠等诸州负责运送军粮。当时临、信、楚、合等诸州百姓,“亦多从逆”。辛昂“谕以祸福,赴者如归”,下令“老弱负粮,壮夫拒战,咸愿为用,莫有怨者”,顺利完成了任务。回京途中,遇到巴州万荣郡民众反叛,围攻郡城,杜绝山路。辛昂对其同伴说:“凶奴狂悖,一至于此!若待上闻,或淹旬月,孤城无援,必沦寇党。欲救近溺,宁暇远求越人。苟利百姓,专之可也。”于是在开州和通州招募三千人,“倍道兼行,出其不意”。辛昂“又令其众皆作中国歌,直趣贼垒”。叛军以为辛昂后面会有大军援救,于是望风瓦解,“郡境获宁”。梁州总管、杞国公亮因辛昂“威信布于宕渠”,遂上表推荐辛昂为渠州刺史,不久就转任通州刺史。辛昂在此“推诚布信,甚得夷獠欢心”。<sup>①</sup>辛昂任期结束回到京城时,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都跟随辛昂到京朝拜,觐见北周皇帝。周武帝因辛昂“化洽夷落”<sup>②</sup>很有成就,对其予以嘉奖,将其进位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北周孝闵帝时,于翼出任渭州刺史。于翼兄于实以前曾担任过渭州刺史,而且在此州“颇有惠政”。<sup>③</sup>于翼到任后,继续沿袭其兄的做法,一方面“推诚布信”,另一方面“事存宽简”,取得了显著政绩。于是“夷夏感悦”,把于翼弟兄比作西汉以清廉著名的“大小冯君”。在任豫州总管期间,霍州“蛮首”田元显的态度也反映了于翼的人格魅力及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显著成效。当时北周与南陈仍处于对峙状态,于翼出任豫州总管后,久围光州的陈将鲁天念“望风退散”。而据险自守、从不宾服的霍州“蛮首”田元显,非常佩服于翼,主动送去人质,请求归附。陈将任蛮奴集中兵力攻打田元显,田元显则“立栅拒战”,对北周“莫有异心”。于翼回到长安后,田元显举兵反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类也”。<sup>④</sup>由此可以看出,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行在民族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其人格魅力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程度。

① 《周书》卷39《辛庆之传附族子昂传》,第698—699页。

② 《北史》卷70《辛庆之传附族子昂传》,第2426页。

③ 《北史》卷23《于栗传附于翼传》,第856页。

④ 《周书》卷30《于翼传》,第523、526页。

北周孝闵帝时,杨敷被任命为蒙州刺史。在此之前,“蛮左”等大都接受北齐所授官职,而且“数为乱逆”。杨敷到蒙州后,“推诚布信,随方慰抚”,“蛮左”等都感激不尽,“相率归附”。<sup>①</sup>杨敷不仅将其酋帅四十余人送到京师,而且还请求朝廷给他们任命职务,其级别与以前北齐所授官职完全一致。“诸蛮”等见状,不仅对北周“愈更感悦,州境获宁”,<sup>②</sup>而且对杨敷更加倚重。周武帝保定中(561—564),杨敷被征为司水中大夫。夷夏官民听到消息后,纷纷通过荆州总长孙俭上表挽留杨敷。但因朝廷正准备东征,对杨敷委以运输重任,所以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

## 二、劝以耕稼及引导民风

由于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少数民族与汉族在习俗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西魏北周时期,郭彦、薛慎和韩褒等官员在其所辖范围内,对少数民族或“导之以政”,或劝以耕稼,或引导习俗改革,都取得了明显成效。

郭彦一生虽以军旅为主,曾跟随大将军宇文贵讨平岷州羌猷傍乞铁葱与郑五丑等人的侵扰,也在跟随柱国于谨南伐江陵时立过战功,但他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主要是由有效解决“蛮左”问题而奠定。

北周孝闵帝即位后,郭彦出任洋州刺史。当时“蛮左生梗”,<sup>③</sup>不仅不遵守朝廷的相关规定,而且在缴纳赋税方面,很多人都不把政府命令当回事。这里的“蛮夷”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聚散无恒,不营农业”。针对这些情况,郭彦先从引导“蛮夷”务农入手,苦口婆心地“劝以耕稼”,严禁他们游猎,要求“民皆务本”,结果家家都有余粮。“蛮夷”弃猎从农之后,连一些“亡命之徒”都愿意缴纳赋税、承担徭役。以前因为洋州缺少储备粮食,每次都靠荆州运送。自从郭彦履职之后,洋州“仓庾充实,无复转输之劳”。郭彦秩满还朝时,“民吏号泣送彦二百余里”,<sup>④</sup>场面十分感人,这也说明郭彦劝以耕稼的做法确实符合“蛮左”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保定四年(564),纯州刺史樊舍突然去世,朝廷急需一位官员去稳定局面。考虑到此地既东接陈朝边境,又“俗兼蛮左”,<sup>⑤</sup>民族关系和外交关系都比较复杂,而且刚刚失去州将,“境内骚然”,因此需要物色一位素质高、能压住阵脚的人物。最后,大家都因郭彦“威信著于东南”,把目光集中到他的身上,周武帝便令郭彦“镇抚”。郭彦不负重托,到达纯州后,官员和普通百姓都“畏而爱之”。<sup>⑥</sup>因此,唐朝史学家令狐德棻等人评价郭彦为“信著蛮陬”。<sup>⑦</sup>

薛慎虽曾担任过车骑大将军一职,但并没有留下值得提起的战功,他之所以会在青史留名,主要因为他的好学、侍读、学师及引导“诸蛮”“有同华俗”的举措。

周武帝即位后,薛慎出任湖州刺史。当时湖州界内的一些“蛮人”,平时都以“劫掠为

① 《周书》卷34《杨敷传》,第599页。

② 《册府元龟》卷397《将帅部·怀抚》,第4720页。

③ 《北史》卷70《郭彦传》,第2421页。

④ 《周书》卷37《郭彦传》,第667页。

⑤ 《册府元龟》卷671《牧守部·选任》,第8023页。

⑥ 《周书》卷37《郭彦传》,第668页。

⑦ 《周书》卷37《史臣曰》,第671页。

务”。<sup>①</sup>薛慎想让他们改掉这种恶习,便把所有酋帅召集在一起,宣示朝廷指令,商量一些事宜,并要求首领每月都来参加一次,如果有的需要汇报工作,可以不设时限。薛慎每次会见他们,都会“殷勤劝诫”,还给他们备下酒席,与他们开怀畅谈。薛慎的劝诫很快就见到了成效,一年之间,湖州“翕然从化”,大家都无比欢欣,相互转告说:“今日始知刺史真民父母也。”从此之后,“襁负而至者,千有余户”。当地有一种习俗,结婚之后,就开始与父母分开居住。熟读儒家经典的薛慎,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对太守和县令说:“牧守令长是化民者也,岂有其子娶妻,便与父母离析。非唯氓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薛慎便“亲自诱导,示以孝慈”,并派守令各自负责所部的教化工作。这些工作很有作用,有些家庭已经“别居数年”,现在重新回到父母身边,履行赡养义务;一些与父母分居时间较短的夫妇,也都带着水果食品“归奉父母”。<sup>②</sup>薛慎对他们的“从善之速”非常感动,如实上报朝廷。周武帝也大力支持,下诏“蠲其赋役”。这样,湖州蛮中兴起了尽心赡养父母的热潮,于是“风化大行,有同华俗”。<sup>③</sup>

当然,移风易俗并非易事,一任官员在几年之内未必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有时出现反弹现象也很正常,需要后任持续发力。薛慎离任后,岐州刺史乐逊继任湖州刺史。乐逊与薛慎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既系统学习过《孝经》《丧服》《论语》《诗》《书》《礼》《易》《左氏春秋》等,是饱学之士,又曾担任过宇文泰诸子的教师和太学助教,“以经术教授,甚有训导之方”。<sup>④</sup>天和五年(570年),乐逊出任湖州刺史,继续沿着薛慎的思路,引导“蛮夷”按照儒家思想和行为准则进行一些改革。史载“民多蛮左,未习儒风”。<sup>⑤</sup>“蛮左,即蛮夷”。<sup>⑥</sup>乐逊到达湖州后,除了“劝励生徒”外,还对他们进行考核,这些措施很有成效,“数年之间,化洽州境”。与薛慎一样,乐逊也非常注重对“蛮夷”在孝道方面的教化。当地“蛮人”习俗是,生了儿子,长大之后大都与父母别居。乐逊“每加劝导,多革前弊。在任数载,频被褒锡”。<sup>⑦</sup>

综上所述,薛慎与乐逊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和方式一脉相承,均有成效,说明对少数民族“华俗”的教化是中央和地方都在倡导的一种风气,也赢得了民心。

韩褒改革羌胡之俗的思路与举措,在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韩褒祖孙三代都有在边疆地区任职经历,其祖父韩瓌曾任平凉郡守,其父韩演曾任恒州刺史。

大统十二年(546),韩褒由北雍州刺史调任西凉州刺史。当地羌胡有“轻贫弱,尚豪富”的习俗,“豪富之家,侵渔百姓,同于仆隶”,结果“贫者日削,豪者益富”。<sup>⑧</sup>韩褒决心改革,其思路和基本做法是:第一,招募贫穷百姓,充实到军队中,优待其家庭,免除其徭役赋税。第二,将富人的财物调拨出来,用于赈济穷人。第三,凡是西域的商货到达凉州,首先满足穷人的需求,让贫者先买。通过这些举措,达到了“贫富渐均,户口殷实”的预期目的。<sup>⑨</sup>

① 《北史》卷36《薛慎传》,第1343页。

② 《周书》卷35《薛善传附弟薛慎传》,第625页。

③ 《北史》卷36《薛慎传》,第1343页。

④ 《周书》卷45《儒林·乐逊传》,第814页。

⑤ 《北史》卷82《儒林下·乐逊传》,第2746页。

⑥ (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史合魏齐周隋书三·蛮左》载:“《隋地志》末段云:‘南郡夷陵诸郡,多杂蛮左。’……蛮左,即蛮夷,乃当时语。”

⑦ 《周书》卷45《儒林·乐逊传》,第817—818页。

⑧ 《北史》卷70《韩褒传》,第2416页。

⑨ 《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1页。

### 三、以“廉简”治理

清廉自古就是官员立身处世的根本,也是社会对官员的基本要求,更是百姓对官员评价的主要标准。历史上凡是受人敬佩、名垂千古的官员都是清正廉洁之士,凡是被人唾骂的都是一些贪婪之徒。清廉官员大都能为所辖之地带来和谐稳定,贪婪之徒往往会激化矛盾,招致民众反抗,引起社会动荡。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些封疆大吏多数都能洁身自好,把清廉作为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法宝,以清廉和公正赢得人心,得到少数民族官员和百姓的信任和爱戴,使当地民族关系始终处于和谐状态。其中,泉仲遵以“廉简”治理“群蛮”、韦瑱以清廉得到“蕃夷”敬重、刘璠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最为典型。

泉仲遵虽然“出自巴夷”,但因受儒家思想和父亲泉企“志尚廉慎”<sup>①</sup>的影响,在任何地方做官,都“以清白见称”。<sup>②</sup>大统十三年,泉仲遵在随开府杨忠与南梁交战中屡立战功,升任三荆二广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浙等十三州诸军事,行荆州刺史。西魏在上津设置南洛州后,泉仲遵出任南洛州刺史。泉仲遵在此“留情抚接,百姓安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起初,“蛮帅”杜清和自称巴州刺史,以州归附西魏。朝廷“因其所据授之”,仍隶属于东梁州都督。杜清和因泉仲遵“善于抚御”,主动要求归属泉仲遵。朝廷在讨论决策时,有些人“以山川非便”<sup>③</sup>为由,否定了杜清和的请求,最终没有同意他的意见。杜清和对此极其不满,便联络安康酋帅黄众宝等人举兵反魏,联军围攻东梁州。王雄讨平杜清和后,西魏改巴州为洵州,隶属于泉仲遵。以前的东梁州刺史刘孟良是个贪官,在任期间贪婪无比,激起了民众的极大愤慨,“人多背叛”。而泉仲遵“以廉简处之”,结果“群蛮帅服”。<sup>④</sup>

韦瑱在西魏恭帝三年(556)出任瓜州刺史。瓜州在中西陆路交通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丝绸之路的商贾重镇。瓜州直接通往西域,“蕃夷往来”非常频繁,前后刺史大都接受他们的“赂遗”,积聚了丰厚财富。但遇到少数民族侵扰边境时,他们又不能抵御。韦瑱和他们截然相反,他“雅性清俭,兼有武略”,凡是“蕃夷赠遗”,他“一无所受”。“蕃夷”既敬畏他的清廉操守,又惧怕他的武略,所以都“不敢为寇”,于是在瓜州出现了“公私安静,夷夏怀之”<sup>⑤</sup>的喜人局面。北周孝闵帝即位后,韦瑱任期届满准备回到京城,瓜州官员和百姓对他恋恋不舍,男女老幼都来为他送行,韦瑱很受感动,“留连十数日方得出境”。<sup>⑥</sup>韦瑱死后,周明帝给予“惠”的谥号,以表彰其以清廉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刘璠本为萧梁人,曾追随宜丰侯萧循和梁武陵王萧纪在徐州、梁州、雍州和益州等地任职。西魏大军抵达南郑时,投降西魏,被提拔为黄门侍郎、仪同三司。周明帝即位初期,刘璠任内史中大夫,负责皇帝的诏令文告。刘璠由于“在职清白简亮”,被贪官视为异类,被庸官视为“不合于时”,结果被降职为同和郡守。对刘璠来说,“左迁”倒是一件幸事。由于他“善于抚御”,结果还未到任期结束,就有五百余家“生羌降附”。以前的一些郡守大多经营商业,积累财富,只有

① 《周书》卷44《泉企传》,第787页。

② 《北史》卷66《泉企传附子仲遵传》,第2334页。

③ 《周书》卷44《泉企传附子仲遵传》,第789页。

④ 《北史》卷66《泉企传附子仲遵传》,第2333页。

⑤ 《周书》卷39《韦瑱传》,第694页。

⑥ 《北史》卷64《韦瑱传》,第2276页。

刘璠“秋毫无所取”。为了融入当地，与羌人打成一片，刘璠的妻子儿女都随从“羌俗，食麦衣皮，始终不改”。刘璠的为人光明磊落和处事公正无私，得到了羌人的普遍赞誉和充分信任，其声誉远播到其他地方，就连洮阳、洪和二郡的羌人也经常“越境诣璠讼理焉。其德化为他界所归仰如此”。柱国蔡公广当时镇守陇右，对刘璠的“善政”大加赞赏。到他迁镇陕州时，想把刘璠带走，羌人对刘璠很依恋，其中有七百人愿意跟着刘璠到陕州，对此，“闻者莫不叹异”。<sup>①</sup>

此外，“世为郡右族”<sup>②</sup>的王子直，于西魏废帝元年(551)被任命为使持节、大都督，行瓜州事。王子直本来就有节俭的习惯，到了瓜州后，“务以德政化人，西土悦附”。<sup>③</sup>“世为西州著姓”的皇甫璠，在北周孝闵帝时出任陇右总管府长史，他“小心奉法，安贫守志，常以清白自处，当时号为善人”。<sup>④</sup>周武帝建德三年(574)，皇甫璠任随州刺史。他“政存简惠，百姓安之”。<sup>⑤</sup>这些都说明以清廉处理好民族关系是一些官员的价值追求和稳定统治的有效手段。

#### 四、积极慰抚

西魏北周时期，一些地方官员在所辖之地以“慰抚”思维和方式处理民族关系，取得了显著效果。其中杨纁“慰抚”稽胡、梁昕“抚以仁惠”、阎庆“留心抚纳”及尉迟运“垂情抚纳”最为典型。

杨纁字显进，正平高凉人。西魏建立后，出任车骑将军。当时稽胡“恃险不宾，屡行抄窃”，宇文泰以杨纁兼任黄门侍郎，前往“慰抚”。<sup>⑥</sup>杨纁“颇有权略，能得边情，诱化酋渠，多来款附”，<sup>⑦</sup>甚至还有一些稽胡跟随杨纁到长安朝拜。由于杨纁“慰抚”稽胡取得显著成效，更受宇文泰的信任和器重。宇文泰因杨纁很有谋略，“堪委边任”，便委派其行建州事。尽管建州远在敌境三百余里，但由于杨纁“威恩夙著”，因此，他所经之处，“多并赢粮附之”。当到达建州时，其众已达万人，轻易击败东魏刺史车折于洛及行台斛律俱步所率二万骑兵，“由是威名大振”。<sup>⑧</sup>

梁昕世为关中著姓。大统十二年，出任河南郡守，镇守大坞。不久，又移镇阎韩。梁昕在此“式遏边垒，甚著诚信”。<sup>⑨</sup>随后，梁昕调任东荆州刺史。荆州为古九州之一，“境域之内，含带蛮、蛮，土地辽落，称为殷旷。江左大镇，莫过荆、扬”。<sup>⑩</sup>史载“其人率多劲悍决烈，盖亦天性然也”。<sup>⑪</sup>梁昕治理荆州的思路很明确，也很简单，即“抚以仁惠”，但效果非常突出，“蛮夷悦之，流民归附者，相继而至”。<sup>⑫</sup>

阎庆在周闵帝即位后，出任河州刺史。河州地处河外，“地接戎夷”。阎庆具有“善于绥抚”

① 《周书》卷42《刘璠传》，第763—764页。

② 《周书》卷39《王子直传》，第700页。

③ 《北史》卷70《王子直传》，第2427页。

④ 《册府元龟》卷806《总录部·贤德》，第9585页。

⑤ 《周书》卷39《皇甫璠传》，第697页。

⑥ 《周书》卷34《杨纁传》，第591页。

⑦ 《北史》卷69《杨纁传》，第2407页。

⑧ 《周书》卷34《杨纁传》，第591—592页。

⑨⑫ 《周书》卷39《梁昕传》，第695页。

⑩ 《南齐书》卷15《州郡志下》，第273—274页。

⑪ 《隋书》卷31《地理志下》，第897页。

的才能,对戎夷“留心抚纳,颇称简惠”。<sup>①</sup>后来,阎庆先后转任云州刺史和宁州刺史,继续沿袭“留心抚纳”的作风,“不苛察”,<sup>②</sup>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普遍赞誉。

尉迟运出身名门,保定四年出任陇州刺史。这一职位对尉迟运来说具有很大挑战性,一方面尉迟运之前主要是带兵打仗,如今要做治民之官,需要角色转换;另一方面,这里“地带汧、渭,民俗难治”,<sup>③</sup>是历任官员颇感头疼之地,如陆腾任陇州刺史时,州民李广嗣和李武等人就“凭据岩险,以为堡壁,招集不逞之徒,攻劫郡县,历政不能治”。<sup>④</sup>此外,陇州所辖地域及其周围历来就有氐羌等少数民族,如代戎(即北戎)在战国时期被击灭后,“其遗脱者皆逃走,西逾汧、陇”。<sup>⑤</sup>再如,氐自“秦汉以来,世居岐陇以南,汉川以西,自立豪帅。汉武帝遣中郎将郭昌、卫广灭之,以其地为武都郡。自汧渭抵于巴蜀,种类实繁,或谓之白氐,或谓之故氐,各有侯王,受中国封拜”。<sup>⑥</sup>有些少数民族比较活跃,给地方政权制造了麻烦,有的甚至会造成严重威胁,如永和五年(140)且冻羌“寇武都”,<sup>⑦</sup>焚烧位于陇州汧源县西的陇关。永嘉六年(312),南安赤亭羌姚弋仲东徙陇州境内的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sup>⑧</sup>如何有效地治理好陇州,尉迟运的前任刺史陆腾主要采取武力镇压的手段,尉迟运则与陆腾不同,他完全采取安抚政策,收到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史书记载其“垂情抚纳,甚得时誉”,<sup>⑨</sup>这也为其在周武帝中后期“职兼文武,甚见委任”<sup>⑩</sup>奠定了基础。

## 五、恩威并用

恩威并用即用恩惠和兵威两种手段处理民族关系,其中元定“威恩兼济”,阳雄“威惠相济”,赵文表平恶抚善及宇文宪对稽胡剪其魁首、余加抚慰的做法最具代表性。

元定出身显贵,其祖父比纥曾任安西将军、务州刺史,其父道龙曾任征虏将军、巨鹿郡守。周明帝初,元定出任岷州刺史。元定到任后,“威恩兼济,甚得羌豪之情”。以前“生羌据险不宾者,至是,并出山谷,从征赋焉”。元定的举措得到了羌人的高度认同,元定回到京城后,“羌豪等咸恋慕之”。<sup>⑪</sup>可见“威恩兼济”方式既能处理好民族关系,又能使元定得到所辖地区少数民族对他的爱戴。

阳雄世代都是豪族,他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的才能及政绩,主要是任洵州刺史和平州刺史时显示出来的。西魏恭帝时期,萧梁将领侯方儿、潘纯随侵扰江陵,<sup>⑫</sup>阳雄随尚书右仆射豆卢宁将他们赶跑。随后,即被任命为洵州刺史。此地“俗杂賸、渝,民多轻猾”。阳雄的做法很简

① 《北史》卷61《阎庆传》,第2183页。

② 《周书》卷20《阎庆传》,第343页。

③⑨ 《周书》卷420《尉迟运传》,第709页。

④ 《周书》卷28《陆腾传》,第470页。

⑤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4页。

⑥ 《魏书》卷101《氐传》,第2227页。

⑦ 《后汉书》卷6《孝顺帝纪》,第270页。

⑧ 《资治通鉴》卷88,永嘉六年十二月,第2790页。

⑩ 《北史》卷62《尉迟迥传附尉迟运传》,第2215页。

⑪ 《北史》卷69《元定传》,第2406页。

⑫ 《周书》卷19《豆卢宁传》,第309页。

单,就是“威惠相济”,结果取得了“夷夏安之”<sup>①</sup>的显著成效。后来荆州“蛮帅”文子荣窃据荆州的汶阳郡,自称仁州刺史,<sup>②</sup>又攻陷了南郡的当阳、临沮等数县。开府贺若敦等出兵讨平后,西魏在其地设置平州,任命阳雄为平州刺史。当时因遭敌寇侵袭、社会动乱,“户多逃散”,阳雄想方设法进行“慰抚,民并安辑”。阳雄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与处理外交关系的思路基本一致。阳雄履职之地有的地处边境和对敌前线,他始终把“保境息民”放在首位,即使“接待敌人”,他也“必推诚仗信”。<sup>③</sup>北齐洛州刺史独孤永业就对其他非常敬重,写信对他大加赞美,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之大。

赵文表在西魏恭帝时期,因随开府田弘出征山南和平定南巴州及信州,对“蛮夷”等南方少数民族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周武帝天和二年(567)到天和三年,赵文表在赴突厥处理和亲事宜时,对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有了进一步了解,对完善其处理民族关系的思路很有益处。

天和三年,赵文表出任梁州总管府长史。梁州所管的恒棱方圆数百里,全是“夷、獠所居”<sup>④</sup>之地,他们凭借地形险要、设施坚固,时常怀有不轨之心。赵文表率领官兵前往征讨,驻扎在巴州。赵文表计划率众径直进军,但一些军官认为,“此獠旅拒日久,部众甚强。讨之者皆四面攻之,以分其势。今若大军直进,不遣奇兵,恐并力于我,未可制胜”。赵文表根据历史经验教训、地形和“夷獠”特点,提出了自己的处理方式和策略:“往者既不能制之,今须别为进趣。若四面遣兵,则獠降走路绝,理当相率以死拒战。如从一道,则吾得示威恩,分遣使人以理晓谕。为恶者讨之,归善者抚之。善恶既分,易为经略。事有变通,奈何欲遵前辙也。”赵文表认为,要想使夷、獠降服,既要给他们一条出路,又要“以理晓谕”;既要明确政策界限,又要注重变通。只要坚持“平叛抚善”原则,就会轻易达到预期目标。赵文表将他的这一想法通知到全部官兵。当时有些僚人参与了征讨夷、獠的军事行动,由于他们大都与恒棱僚相识,就把赵文表的意图如实告诉了他们。正当恒棱僚聚在一起讨论且犹豫不决时,赵文表所率大军已到他们的地界。赵文表令大军驻扎在大蓬山下,对他们“示以祸福”,他们都很知趣,“遂相率来降”。赵文表都一一“慰抚”,仍然“征其税租”,<sup>⑤</sup>他们当中没有敢拒绝的。后来,赵文表被任命为蓬州刺史,由于他“政尚仁恕”,<sup>⑥</sup>又“大得獠和”,<sup>⑦</sup>结果“夷、獠怀之”。<sup>⑧</sup>

宇文宪是宇文泰和柔然女人达步干氏的儿子。在出任益州刺史期间,“尤长于抚御”的宇文宪“留心政术,辞讼辐凑,听受不疲。蜀人怀之,共立碑颂德”。<sup>⑨</sup>在对待稽胡问题上,宇文宪的处理方式是“剪其魁首,余加慰抚”。建德五年,北周在晋州击败北齐军队,齐人只顾逃命,把甲仗四处丢弃。稽胡乘机抢劫这些武器,据为己有。于是,他们拥戴原稽胡领袖刘蠡升的孙子刘没铎为首领,号称圣武皇帝,年号石平。如何征服稽胡?有些大臣主张“穷其巢穴”。宇文宪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稽胡“种类既多,又山谷阻绝,王师一举,未可尽除”。怎样才能有效解决稽胡问题呢?他的应对策略是,应当区别对待,即“剪其魁首,余加慰抚”。这样可以有效瓦解稽胡,争取到绝大多数稽胡的支持。宇文宪的想法得到了周武帝的赞同,被任命为行

① 《周书》卷44《阳雄传》,第797页。

② 《北史》卷68《贺若敦传》,第2379页。

③ 《周书》卷44《阳雄传》,第797页。

④⑥ 《北史》卷69《赵文表传》,第2405页。

⑤⑦ 《周书》卷49《异域传上·獠传》,第891页。

⑧ 《周书》卷33《赵文表传》,第582页。

⑨ 《周书》卷12《齐炀王宪》,第196、195、188页。



军元帅。建德六年,宇文宪督行军总管赵王宇文招、谯王宇文俭、滕王宇文逌等出征。到达马邑时,他们“分道俱进”。刘没铎先遣其党天柱防守于河东,又遣其大帅穆支据守河西,计划“分守险要,犄角宪军”。<sup>①</sup>按照宇文宪的命令,谯王俭攻天柱,滕王逌击穆支,都将他们击破,斩首万余级。宇文招又擒获刘没铎,将其斩杀,其余部众全部投降,于是“胡寇平”。<sup>②</sup>

## 六、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和实践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儒家思想是主要思想来源。西魏北周时期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及实践,都是在其思想支配下进行的。尽管他们的民族成份、家庭出身、个人经历、接受教育程度、任职地域等不尽相同,但他们的思想都来源于儒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宇文泰、宇文邕和宇文赧祖孙三代的和亲政策,庾狄峙“建和戎之功”,<sup>③</sup>王庆到吐谷浑“论和好之事”等,<sup>④</sup>都与“礼之以和为贵”<sup>⑤</sup>思想一脉相承。再如,汾州刺史韩褒认为,如果侮辱俘虏,就会进一步增加仇恨,因此,他要求“所获贼众”,“一切放还,以德报怨”,<sup>⑥</sup>这与孔子的“以德报德”思想完全一致。又如,儒家强调德治的教化作用,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sup>⑦</sup>中外府司马达奚寔对“历世羈縻,莫能制御”的山氏,“导之以政”,使“氏人感悦,并从赋税”。<sup>⑧</sup>达奚寔的思想显然来自儒家思想。诚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孔子就对诚信十分推崇,认为“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sup>⑨</sup>不少地方官员主张以诚信对待少数民族,如通州刺史辛昂“推诚布信,甚得夷獠欢心”;<sup>⑩</sup>蒙州刺史杨敷“推诚布信,随方慰抚”;<sup>⑪</sup>秦州刺史独孤信在陇右多年,“威申南服,化洽西州,信著遐方,光昭邻国”;<sup>⑫</sup>平州刺史阳雄不仅对当地民众进行“慰抚,民并安辑”,而且在“接待敌人”时,也“必推诚仗信”。<sup>⑬</sup>韦孝宽在《上武帝疏陈平齐三策》中所提出的“还崇邻好,申其盟约。安人和众,通商惠工,蓄锐养威,观衅而动”<sup>⑭</sup>观点,与儒家思想观点非常吻合。由此可见,西魏北周多数大臣的思想都与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其二,“和”是处理民族关系的核心理念。“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既有和谐、和睦、融洽之意,如《左传·隐公四年》载:“臣闻以德和民,不闻以乱。”《孟子·公孙丑下》载:“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天论篇》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又有和平、讲和、和解之意,如

① 《周书》卷49《异域传上·稽胡传》,第898页。

② 《周书》卷13《文闵明武宣诸子传附属赵僭王招传》,第202页。

③ 《北史》卷69《论曰》,第2410页。

④ 《周书》卷33《王庆传》,第575页。

⑤ 《礼记》卷10《儒行第四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1页。

⑥ 《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2页。

⑦ 《论语·为政第二》。

⑧ 《周书》卷29《达奚寔传》,第503页。

⑨ 《论语·卫灵公》。

⑩ 《周书》卷39《辛庆之传附属子昂传》,第699页。

⑪ 《周书》卷34《杨敷传》,第599页。

⑫ 《北史》卷61《论曰》,第2193页。

⑬ 《周书》卷44《阳雄传》,第797页。

⑭ (清)严可均辑:《全北齐文全北周文》卷6《上武帝疏陈平齐三策》,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61页。

汉高祖三年(前204)，“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遂围汉王。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sup>①</sup> 同年，“汉王使酈食其说齐王田广，罢守兵与汉和”。<sup>②</sup> 西魏北周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处理方式多种多样，但只有“和”的理念及行动上下呼应，贯穿始终，影响很广，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与柔然、突厥和亲。西魏与柔然有二次和亲，一次是西魏将化政公主出嫁柔然首领阿那瓌之弟塔寒，另一次是西魏文帝娶阿那瓌的女儿为皇后。<sup>③</sup> 关于西魏北周与突厥的三次和亲，前面已经述及，此不赘述。二是大统十六年魏文帝“恐蠕蠕乘虚寇掠”，乃遣大臣杨荐到柔然“更论和好，以安慰之”。<sup>④</sup> 三是成州刺史赵昶积极调解氏首杨法深与杨崇集、杨陈恁之间的矛盾，推动他们“和解”。鉴于氏首杨法深“举众内附”“职贡不绝”，<sup>⑤</sup>又与其种人杨崇集、杨陈恁“各拥其众，递相攻讨”的现状，赵昶从民族关系和西魏稳定大局出发，派遣使者做“和解”工作，最终使他们都纷纷表示“从命”。<sup>⑥</sup> 四是大都督王庆在保定二年出使吐谷浑，“与其分疆，仍论和好之事。浑主悦服，遣所亲随庆贡献”。<sup>⑦</sup> 五是庠狄峙的“和戎”之术使“屡为边患”的柔然“不复为寇”，得到了宇文泰的赞赏：“昔魏绛和戎，见称前史。以君方之，彼有愧色。”他在任都督益潼等三十一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时，继续沿袭“和戎”思路，崇尚清静无为，“甚为夷獠所安”。<sup>⑧</sup> 以上这些标志性事件，突出反映了“和”的理念在西魏北周时期处理民族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其三，“抚”是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方式。以“抚”的方式处理民族关系的政治智慧古已有之，如东汉和帝在永元十三年(101)的诏书中就提出“抚接夷狄，以人为本”<sup>⑨</sup>的主张。西魏北周高层，很多人都主张要对少数民族“抚慰”，如宇文泰就在平定梁、益之后，下令对所在地区的僚予以“抚慰”，结果“其与华民杂居者，亦颇从赋役”。<sup>⑩</sup> 侯景撤离荆州后，宇文泰令大都督独孤信为大使，“慰抚三荆”。<sup>⑪</sup> 许多地方官员也喜欢以“抚”处理民族关系，争取人心，如史宁为东义州刺史时就“留心抚慰”；刘璠为同和郡守时“善于抚慰”；贺兰祥为荆州刺史时对远近“蛮夷”“随机抚纳”，<sup>⑫</sup>“颇有惠政”，使汉南原逃亡百姓“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远近蛮夷，莫不款附”。即使向吐谷浑用兵，贺兰祥也是为了实现他的“抚安西土”<sup>⑬</sup>战略目标；阎庆为河州刺史时“留心抚纳”<sup>⑭</sup>、“善于绥抚”；<sup>⑮</sup>泉仲遵为南洛州刺史时“留情抚接”；<sup>⑯</sup>武州刺史、车骑大将军赵昶对所“虏获氏、羌，抚而使之”，“不烦国家士马”就“能威服氏、羌”<sup>⑰</sup>等；梁州总管府长史赵文

① 《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372—373页。

② 《汉书》卷1上《高祖纪上》，第43页。

③ 崔明德：《中国古代和亲通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0—141、559—560页。

④ 《周书》卷33《杨荐传》，第571页。

⑤ 《周书》卷49《异域传上·氏传》，第895页。

⑥ 《北史》卷96《氏传》，第3177页。

⑦ 《周书》卷33《王庆传》，第575页。

⑧ 《周书》卷33《庠狄峙传》，第569、570页。

⑨ 《后汉书》卷4《孝和帝纪》，第189页。

⑩ 《周书》卷49《异域传上·獠传》，第891页。

⑪ 《北史》卷61《独孤信传》，第2168页。

⑫ 《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第8251、8252、8253页。

⑬ 《周书》卷20《贺兰祥传》，第338页。

⑭ 《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第8253页。

⑮ 《周书》卷20《阎庆传》，第342页。

⑯ 《周书》卷44《泉企传附子仲遵传》，第789页。

⑰ 《周书》卷33《赵昶传》，第578页。

表即使在征讨恒稜僚时,还坚持“归善者抚之”的原则。<sup>①</sup>

那么,“慰抚”内容有哪些呢?从相关记载来看,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信义”和“诚信”,如长孙俭任秦州长史时,对西夏州的许和就“以信义招之,和乃举州归附”;辛昂任渠州和通州刺史时以诚信慰抚,“甚得夷獠欢心”。<sup>②</sup>二是“仁惠”,如东荆州刺史梁昕对“蛮夷”“抚以仁惠”。<sup>③</sup>三是“廉简”,如南洛州刺史泉仲遵以廉简治理“群蛮”,瓜州刺史韦瑱以“清廉”得到蕃夷敬重,同和郡守刘璠以清廉之政争取羌人等。从各地具体实践来看,以“抚”处理民族关系的成效非常显著,如车骑将军辛昂在梁益“抚导梗化,安置城镇,数年之中,颇得宁静”;<sup>④</sup>东荆州刺史梁昕“抚以仁惠,蛮夷悦之,流民归者相继而至”;<sup>⑤</sup>勋州刺史韦孝宽“善于抚御,能得人心”;<sup>⑥</sup>陇州刺史尉迟运“垂情抚纳,甚得时誉”<sup>⑦</sup>等。

其四,善于从多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西魏北周时期,民族关系始终呈现复杂性、多样性状态,南朝与北朝处于对立状态,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处于争斗状态,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有时也处于矛盾状态,这些都会使中央上层和地方官员在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时统筹考虑各种关系。如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争斗时,往往会考虑柔然、突厥、梁、陈等政权的动向和态度,出兵吐谷浑时总会考虑突厥和北齐的动向及态度,与梁、陈交往时,也会考虑北齐、吐谷浑及氏羌的动向。如大统二年西魏派镇南将军、丞相府从事中郎韩褒出镇浙郿,就是考虑了“梁人北寇商洛,东魏复侵樊邓”<sup>⑧</sup>的因素;选派黄门侍郎庠狄峙出使柔然,就综合考虑“时与东魏争衡,蠕蠕乘虚,屡为边患”<sup>⑨</sup>等因素;西魏配合突厥出兵吐谷浑,肯定会考虑“吐谷浑通使于齐”<sup>⑩</sup>的情况;大臣于翼鉴于北周在边境修筑防御工事、增加戍兵而北齐和陈朝“亦增修守御”的实际情况,遂向周武帝提出“解边严,减戎防,继好息民,敬待来者”<sup>⑪</sup>的建议,被周武帝完全采纳。可见,西魏北周君臣和地方官员都比较善于从多方关系思考和处理民族关系。

〔责任编辑 马 骅〕

① 《周书》卷49《异域传上·獠传》,第891页。

② ⑤ 《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第8252页。

③ 《北史》卷70《梁昕传》,第2422页。

④ 《册府元龟》卷656《奉使部·招抚》,第7862页。

⑥ 《周书》卷31《韦孝宽传》,第538页。

⑦ 《册府元龟》卷692《牧守部·招辑》,第8253页。

⑧ 《周书》卷37《韩褒传》,第661页。

⑨ 《北史》卷69《庠狄峙传》,第2394页。

⑩ 《北史》卷61《史宁传》,第2187页。

⑪ 《周书》卷30《于翼传》,第525页。